

皖南事变的原因探析

吴凤琴 张冬华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主力共9000余人由皖南北移,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谋部署的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约7000名新四军将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导致皖南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蓄谋已久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必然结果。

1935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蒋介石认为这些革命武装的存在、发展、壮大构成了对其统治的严重威胁,所以曾千方百计进行清剿。1937年二三月间,国共两党西安谈判时,我党曾提出在改编陕北主力红军的同时,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国民党在“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的口号下,一面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无条件集中,由国民党派一批人来担任军职等无理要求,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七七”事变爆发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蒋介石为了达到控制、收编红军游击队的目的,1937年九十月间,单方下令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将南方各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叶挺军长编遣调用。但事与愿违,1937年底,叶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并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使蒋介石的阴谋破产。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组建工作展开后,各支队迅速挺进华中抗日前线,随后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地区展开,从敌伪手中收复失地。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使蒋介石感到极度恐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限共”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限共”活动,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的重点由华北移向华中,把矛盾指向新四军。他们在对皖东、苏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失败后,决意进行报复,消灭皖南新四军。正值此时,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

订军事同盟条约,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攫取东南亚,加紧诱降蒋介石。而英美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也极力拉蒋,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时的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以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式积极援华,1940年10月16日,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所有这些无疑抬高了蒋的身价,造成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际环境,使蒋介石更坚定了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决心。

第二,中共中央对形势分析的失误和项英的不主动,导致皖南新四军错过了北移的时机,使蒋介石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能够得逞。

1940年10月苏北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要报复,便着手布置皖南事变。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宣布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佳电》声明,中共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同时也列举了部队北移的种种实际困难,要求国民党中央“宽以限期”;“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可见,中共中央北移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中央对皖南情况缺乏直接和具体了解,只能从全局出发,所以,对何时北移最为有利,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十分准确的估计,以致几次指示项英“拖一两个月”,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部队停止东进的交换条件,又批准苏北部队发起曹甸战役,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项英率部北移的决心。而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险恶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舍不得放弃南进的错误设想,对北移犹豫不决,在中央下定决心之后,仍迟迟不肯北移。所有这些,都使皖南新四军丧失了国民党军队围剿部署就绪前进行北移的有利时机。

第三,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上选择的失当,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事变造成口实。

新四军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云岭向东北进入苏南,再通过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沿途我军设有兵站,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另一条是从繁昌、铜陵之间通过日伪封锁线渡口,到达江北无为地区。这条路线最大的优点是路程近,而且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往来的路线。以上这两条路线虽有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但皖南新四军如按这两条路线北移遇到危险,可以得到其他就近部队的策应。可是,由于项英南进思想的作怪,而选择了所谓“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方案,向南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到达漂阳再待机北渡。从军事上看,这条路线山路难行,国民党军队密布,又得不到新四军其他部队的策应和支持,我军很难通过。而且,由于蒋介石早在12月10日就已下令新四军“只准其由江南就地北渡”。所以,从政治上讲,向国民党的后方行动,无疑会给顽固派提供挑起反共内战的口实。项英选择这条路线无异于自投罗网。

第四,项英优柔寡断的错误指挥,致使皖南新四军损失惨重。

在北移的军事行动中,当1月7日部队从高岭向星潭进发受阻后,军部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叶挺等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冲出包围的正确主张,项英不同意,自己又提不

出其它方案,会议持续了7个小时之久,项英仍犹豫不决,最后在叶挺的一再催促下,项英作出了不攻星潭,部队原路折回,改从高岭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而1月8日部队到了高岭,碰到敌顽79师部队,项英为避免作战,又提出部队再撤回里潭仓,改从茂林方向突围,部队又走了一次回头路。项英这种举棋不定的错误指挥,使近万人之大军辗转反复于敌人重围之间,不仅影响了军队的士气,而且也丧失了多次化险为夷的机会。特别是在最危机的关头,项英竟擅离指挥岗位,一度离队私自出走,致使军心涣散,最终使整个皖南部队陷入绝境,为敌所败。

第五、新四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本身固有的封建沉垢和积习、小生产者的狭隘和偏见,也是导致惨败的原因之一。

这一方面表现就是当时的新四军部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项英凭着令人倾慕的革命经历,同时担任着几个显赫的军政职务,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意识,在新四军军部自当拥有绝对的权威,以至于在皖南部队转移的整个行动中,根本不接纳军部其他首长的正确意见,结果给皖南新四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新四军各支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尤其是皖南新四军,虽是军的直属部队,扩充得没有像其他在敌后作战的部队之迅速,但70%以上都是皖南当地人。这些战士之所以参加队伍,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家乡、保卫皖南,要他们离开皖南北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朱、彭、叶、项在复《皓电》的《佳电》中就曾指出:“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至难。”为此,皖南新四军领导和各级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北移的时间。

总之,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它的发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国共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新四军组成史略》,《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83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第82、2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六大以来》(上)第11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廖盖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第7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段雨生等:《叶挺将军传》,第3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单位:吴凤琴,佳木斯师专历史系;张冬华,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